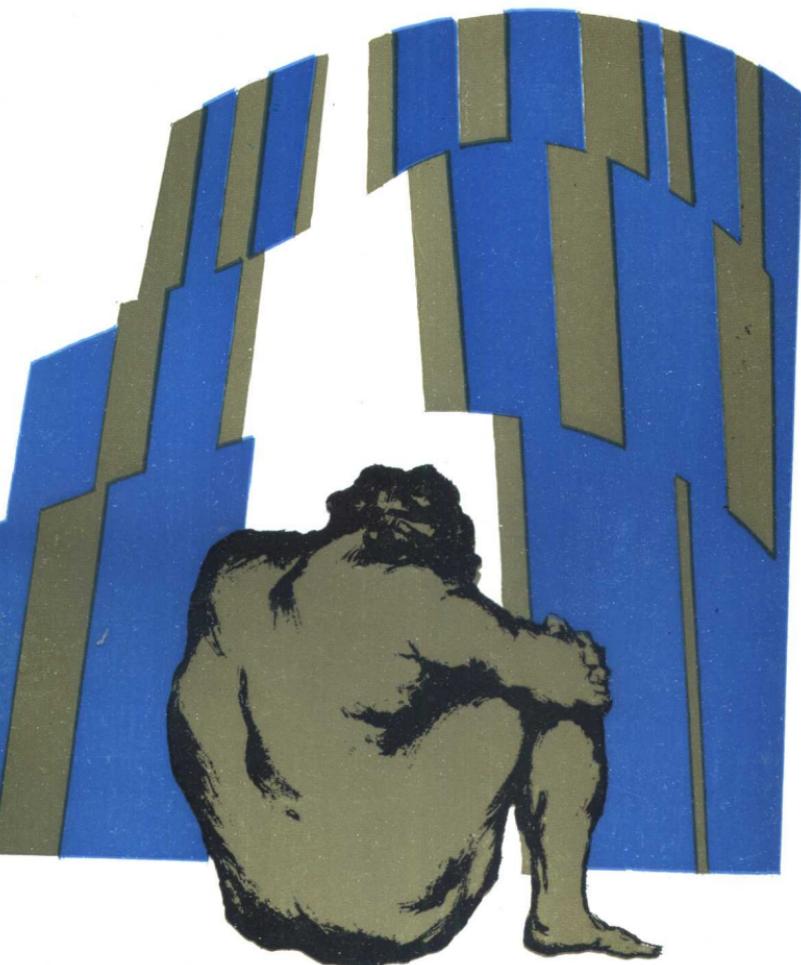


# 大地的仲裁

傅星



YACONGSHU



1



2 034 4544 1

# 大 地 的 仲 裁



王士禛·重刊

责任编辑：王 飞

封面设计：李 筏

---

## 大 地 的 仲 裁

傅 星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25 插页：3字数：217千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3,950

---

书号：10114·286 定价：1.85元

## 内 容 介 绍

本书包括四个中篇小说。《大地的仲裁》写受“文革”影响的这一代青年的辛酸；《这嘈嘈杂杂的日子》写城市生活对乡村生活的冲击；《圣职》和《我的古堡》对比了两代人的不同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

作者对生活敏感，善于捕捉有意义的事物，常常通过写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来把握时代的脉搏，加之流畅、生动的语言，使作品散发出一股富于朝气的生活气息。

作品有一定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

## 目 录

大地的仲裁.....	(1)
圣 职.....	(70)
这嘈嘈杂杂的日 子 .....	(147)
我的古堡.....	(254)
后 记 .....	(351)

## 大地的仲裁

傍晚，每当父亲屋里的那口座钟敲过五下之后，我的脑袋便开始发胀；手掌、脸部也都会泛起潮热，而左胸的“牵引感”则更为明显，并隐隐地有些作痛。出院已经六十三天了，“雷米封”及其他的一些药物也未断过，但这些症状还是没有完全消除。

我是在下乡的第六年染上肺结核病的。据医生们讲，如果当年能及早发现、抓紧治疗；如果能够好好休息、注意锻炼和营养的话，那么疾病就不至于侵入得如此之深。但是一听到这类话我就来气。“如果抓得紧”，“如果注意锻炼”，怎么“如果”？在那里，照一下X光要坐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和一天一夜的渡船。而且又怎么可能离开工地，穿上毛茸茸香喷喷的睡衣，躺上那么一年半载呢？去了解一下看，当时的医务室是如何掌握病假标准的：三十八度以下给你几片感冒药；三十八度以上给你个半天一天的休息还得经过工地指挥部的同意。而就我这类的“孱头”来讲，一点头昏，咳嗽，低热，又怎么会踏进医务室的门呢？我常常听见老外婆这么说：“为什么当年一定要逼着你下乡去？为什么得这么重的

病也不给你好好治？比起小时候……真叫作孽哟……”看来，只有她才是了解我的。在学校的时候，乒乓、足球、长跑、溜冰，什么体育活动少得了我？“这孩子就象牛一样结实。”老人在邻居间常常这样炫耀她的外孙。可是现在呢？当然，我知道医生们今天的这种责备是属于职业性的，并没有什么恶念。但是在我听来就好象指责我是有意在作贱、糟蹋自己似的。他们怎么就不安慰安慰病人，也那样地来两个“为什么”？不是有医护心理学吗？

整个花园被夕阳涂上了一层暖色——“非那更”糖浆似的暖色，这使我想起了苦、涩、甜交加的滋味。围篱的投影以香樟树和苹果树为切点形成了一个半圆，十一分钟以后这投影将罩向那口枯井；十五分钟以后，整个大理石台阶都将被吞没——六十三天来，我从未放弃观察，这是最新记录。藤蔓上，两朵粉红色喇叭型小花在落日的余晖中闪光。在这百花凋零季节的强劲秋风中，它们顽强的生命力令我不解。从上月二十五日早晨睁开眼睛看到它们起，我就试图解开这个谜。

六十三天了，我卧在这张二尺多宽的小钢丝床上，靠思念、追忆、自责、嫉妒消磨时光。如果有幻想，那可能还好些，但是没有，挤都挤不出来。穿衣镜中，那张埋在鸭绒枕头里的苍白的脸，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说：他是二〇一研究所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伙夫，一个彻彻底底的窝囊废！不过，三十岁了，也该为幻想的失落而凭吊了。

花园的小木门“咯吱”地响了一声，邮递员沿着沙砾小道

走了过来。她叩叩玻璃窗，笑笑，然后将晚报塞进窗缝里。上星期六，她给我送来了大炮的一封信。大炮笔头很懒，即使写信也是三言两语，草草了事。这次也是这样：“徐炤，请几天假，来一次。你早就说过要来，为什么还不来？”

回上海四年了，我没有回农场去看过他们。这主要是因为抽不出时间。可是这次我决定了。去。至于身体能否经受得住旅途的颠簸；病假期间作此远足是否会在单位里引起什么非议和责难，我都全然不顾。

这两天外婆时时在我耳旁唠叨不止。她劝我留在家里养病，说在外面如果没有人叮嘱的话，我会把吃药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的。我从她汪汪的泪眼中，看出不安、忧虑和怜悯。作为一个感情长期处在饥渴中的人来说，我对这些格外珍视。我把这些感情作为最宝贵的东西收入内心。“你放心吧，就要回来的，三两天就要回来的。”但是我自己知道，这仅仅是宽慰话而已。如果那里的阳光、土地；那里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依然能够给我亲切感，依然能够与我和谐在一起，那么为什么不多呆上一阵子呢？

当然，现在还说不清楚，去了以后能得到些什么。“这座城市不需要我，躲开它！”我的行动意图仅此而已。前天晚上，我大叫大嚷了一通，第二天便托人去买了船票。是的，那天晚上我打了他，我无法克制自己。不后悔，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他太过份了——我说的是弟弟徐焰。

疾病把我的思想逻辑完全破坏了。思路常常在错综复杂的往事中纠缠不清。现在，要我对一桩事件、一个人物不受

干扰地进行思索，看来很难，也不习惯。……这是一种病态的意识流，随它去吧……

徐焰今年二十岁。在我下乡的那年，他只不过是个拖着鼻涕、才齐我肚脐眼的小学生。可是现在他的身高已超过了一米八〇。“我能达到一米八三。”他曾经断言道。一米八三，现代高度。他超过了我，并将永远俯视着我。每当我晃着才一米七几的个头擦着他那结实的肩膀匆匆而过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白鼠一样怯懦无能；并感到有一种宿命的无可违拗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俩的关系。

没有比这个S大学动力专业的高材生更值得自傲的了。他什么都不缺：才智、相貌、机会。命运给他所有的通道都亮起了绿灯。

他常常谈“哈佛大学”，“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他的同学们一起谈，谈得眉飞色舞，忘乎所以。起先，我还以为这仅仅是一种普普通通的聊天而已，如同我们平常谈及某某女明星漂亮，某某小说有趣一样。但是我错了。那次，我好不容易弄来了一些细木头条子，准备把客厅的水门汀地板铺上一层。我干得满头大汗，精疲力尽，于是便招呼他过来帮个忙。可他把两手插在裤袋里，踱来踱去，吹着口哨；还嘻皮笑脸地问我肯出多少手工钱。我火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说了一通，什么家庭成员的义务，栽树和乘凉的关系等等，反正乱七八糟，语言随口而出。但是他用一种异样的声调把我的话打断了。“够了！”他的手臂抡了个圈，“这里的一切，客厅、卧室、厕所、马桶，还有那边所有的破碗烂

碟，都归你！叫父亲立个遗嘱，都归你！我用不着，将来我绝对用不着，我起誓！”他看着我。那目光绝不是充满幻想、柔和可爱的，而是坚定有力地朝着远处一个目的地。我一下子理解了他的全部意思。我承认，他的豪情壮志，傲气和自信，当时完全把我震慑住了。

我是“唐K”。他第一次用这个外文称呼我是在去年夏季。有一天他从学校给我来了个电话：“喂！你把书橱里的那本《高等数学》给我拿来。立刻拿来。要考试了……喂，听见了吗？喂！”我“叭嗒”一下把电话机搁上了。他把我当成了男仆，可是对男仆也应稍稍放得尊重些，不叫哥哥，但至少给个称呼吧？“喂！”“喂！”——什么腔调！可我这个人生性犯贱，一想到他那副每逢焦虑就会变得红亮透明漏得进光的耳朵，我便控制不住自己拉开橱门为他寻找那本该死的《高等数学》。可是我怎么会知道他要的不是我所拿的这本，而是要一个什么姓樊的编的那本呢？我怎么知道这本黄底红字封面的书，其中的一些定义、公式都早已过时了呢？我怎么知道呢？我不是连平面几何中的两条直线的问题至今还都未弄清楚吗？当他把书扔还给我的时候，最初是左嘴角不满地抽搐了几下，而后就是：“唐K。”

“唐K，牛奶热了没有？”“唐K，早晨五点钟叫我。”“唐K，我那件滑雪衣呢？”——不久，这便成了习惯。他说“唐K”是“绅士”的意思。“绅士派头”，他亲昵地拍拍我的后脊梁。“我越来越羡慕你这副派头。”可只有鬼才相信他。他肚子里什么馊点子没有？“毛脚蟹”、“西瓜牙”、“大拚盆”——自小，他

就有替别人起绰号的嗜好。前两个月，中学里的一个老师来看我。好多年不见了，这次听说我身体不好，她特意跑来，真叫我感激不尽。我们随随便便地聊。她谈起过去班上同学的一些情况，我听来津津有味。可就在这时，徐焰闯进来，要我帮他回忆一下他第一次坐火车是在几岁。这么点屁大的事不能等客人走了以后再烦我吗？可是他偏不，偏要在那个时候缠着我，而且就当着人家的面，“唐K”，“唐K”地叫得别提有多欢。“他是怎么称呼你的？”等那小子滚蛋了以后，老师问。我苦笑了一下，摇摇头，然后就把来龙去脉简单地说了说。她起先捧腹大笑，可接着便陷入沉思。“说下去呀，你刚才提到了那个谁……”我提醒道。“是呀，是呵……是呵……”可见她已经神不守舍了。一会儿，她便起身告辞。在临出门的时候，她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唐K——donkey，译成中文为‘驴子’的意思……你弟弟比你有学问，也，很幽默，是的，相当幽默。”而后，她抿了抿花白的鬓发，头也不回地走了。

可是我直到今天，才把我的老师当时的心情完完全全地感受到。

寒假，徐焰是什么地方也不去的。这样，到了晚上，我俩就在一个屋子里呆着。他钻他的学问，我翻我的工农业余中学初等教育课本。据说拿不到初中文凭就不给加工资，我这是被逼上梁山。但是在这种晚上，也少不了有矛盾。

不知怎么搞的，每当我被那些数学题弄得头晕目眩的时候，随着一声喟然长叹，我左右两手的拇指和中指便会弄出

“噼啪”、“噼啪”的响声来。“准备跳西班牙舞吗?”于是,他就在一旁用这种尖刻的语言来制止我。在生活细节上,我在小时候有过许多不良之习,比如:“咻”一下可以把一口痰飞出几尺远;再比如:吃饭的时候,常常把嘴唇咂巴出母猪嚼食般的声响。但是这些都改了。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个打响指的习惯。如果有人对此感到讨厌的话,我这个三十岁的人完全有能力克服。首先,这是我的不对,我承认。思路被打断,灵感被驱走——他确实受到干扰。可问题是,哪一個做兄长的能够接受这种语言呢?他就不能象个人样地好好地说吗?“今天就是要在你面前跳几下西班牙舞又怎么样?怎么样?你能怎么样?你这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我大声嚷嚷着,可只是在心里头嚷嚷,而在行动上却从不敢造次。我总是老老实实地重新趴上写字台,埋下头去。对于自己的这种乖顺,我也不止一次地骂过。不过,那也是一种无声的咒语罢了。可是反过来说,他又怎么样呢?他在休息的时候,哪一次没有打开过录音机呢?“换换脑子。”他是这么说的。可考虑过我吗?人类的那种将知识朝里扒的行为本身,是有同等价值的。这个道理不能不说清楚。就此,我找他谈过,我一本正经地把事情摊在桌面上,希望他能够严肃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可是他怎么样呢?“咝—— $\frac{1}{2} + \frac{1}{2}$ 等于 $\frac{2}{2}$ 吧?咝——”他捧着我的书,挠着后脑勺,装模作样地蹙着眉,嘴里还“咝”呀“咝”地倒抽着气。我是使足了劲才拼命克制住的。但事实上,那时候就该给他一下子。

用不着他来提醒我，就我对自己存在的认识而言，从未有过待价而沽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值多少钱，“自身是最遥远的星球。”这种说法我向来就不信。

在那所职业业余学校，三门功课考试总分相加不满百分的共有五人，而我就是其中之一。看起来就象是有意在捣蛋一样；似乎对现行的职工教育政策有何不满，以此来表示抗议。但事实并不如此。在那四堵墙壁围合的课堂里，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一种绝望情绪；把我的脑子完全搅成了浆状。我还学什么呢？……上课铃响了，门“砰”地一下被踢开，许多人一齐涌进教室。“操娘的，儿子踩到爸爸的脚啦！”“操娘的，爷爷偏踩孙子！”——这种顽童般的骂娘声，把我的年龄一下子否定了二十岁。课桌椅是低年级用的，腿必须叉开才能安置得当。桌面上刻着某某是坏人，某某是好人的七歪八倒的儿童体，而那上头的油漆味和口水味又引起了我嗅觉器官的反应。我的同桌有一张低能儿的脸形：尖脑、斜白眼，非但两个鼻腔唏溜唏溜个没完没了；而且脚丫子还散发着“阿莫尼亚”气体。“王老师今天嗓子不行，王老师感冒了，上课时要安静些，听见了吗？”站在讲台上的，看来要比我小上整整一辈的王老师把下面的听众都当成了布娃娃。而她的那张脸则又使我想起在农场的时候，一个常在我们宿舍门前玩泥丸丸的小丫头。记得有一次我塞给她一块糖饼，可刚巧被她母亲撞上，于是便不由分说地被抽了一顿屁股。“……听见了吗？”可爱的王老师居然有时候还用教鞭点着我的鼻子问。“听——见——啦——”，我真应该尖起嗓门这么回答；而且还该

向她作出保证：两手臂保证放在身后；书写格式保证从左到右；作业本上保证没有墨团团……就这样，一旦被这种气氛笼罩住，我的胸口便会隐隐作痛，眼眶里溢满泪水，整个大脑杂乱如麻。

孤独，在家里甚至比在外面还要孤独。母亲早在十多年以前便死去了。我想如果她在世的话，也未必能够驱散我心头的乌云。外婆把对我的侍候当作她晚年唯一的事业；把对我的怜悯当作她仅有的情感输出，但是她绝对成不了我的知音，成不了我倾吐衷肠的对象。而至于父亲，这个某公司的经理，他给了我一些什么呢？不错，他曾经对我的婚姻表示关心。那是在一个星期日的午后，他醉意朦胧地靠在躺椅上抚摸着母亲的遗像，“炤炤，你该结婚了吧，都快三十了……”他突然这么说道。我不作声。“我看那个挺好，那个常来的谁谁谁……”我等着他谁出个名堂来，但是他拍拍后脑勺就算完了。这种记忆的错误会使一个没有母亲的儿子感到伤心的。三年多来，可以说我没有和一个象象样样的姑娘有过接触，而那个什么“常来的”又从何谈起呢？一条用自卑感和反抗意识构筑成的大坝，把我同我所爱着的以及我所可能爱的女性彻底隔开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象个殉道者一样，漫游在茫茫的苦海之中。

过去可不是这样的。过去，大炮称我谓“情种”，说凡是有姑娘的地方就有我的沃土良田。这小子！

这里，玻璃台板下，有一张集体照，是我在离开农场的时候同大伙合的影。坐在前排的那几个姑娘。现在看来简直个

个都能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可是以前，我却对她们竭尽所能地百般挑剔。右三的那个叫李蓉蓉，多美，如同天仙一般，而性情又是那么温和，艺术情趣又是那么高雅，好久以前就知道毕加索、海明威。有一天，支部书记丁老头跟我说：“小徐呵，你这个团干部是怎么做的呵？她们，”他指了指李蓉蓉同另外一个女青年。“她们不是两个身子一个脑袋吗？这几天怎么啦？去，做做工作去……”于是，我便找了李蓉蓉。起先，一切都懵懵懂懂的，费再大的劲，也无法搞得清楚她们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在一个晚上，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我同李蓉蓉坐在河边的一棵水杉树底下，一开始仍然是颠来倒去地说那几句话，什么要多多自我批评啦；什么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啦。后来，因为倦了，我才安静下来。这时候，夜莺在柔声鸣啭，河水在汩汩流淌。突然，我的“帮助对象”轻轻地捏住了我的手，旋即一串泪水洒上了我的手臂，那泪水，如同露珠一样冰凉。“你别说了，我对她没有意见，只是，只是……你坦率地告诉我，你喜欢她吗？”

当时，我只觉得她的风度不够，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我的无动于衷。可是“风度”，方的？扁的？真见他妈的鬼。人们常常宽恕自己过去的感情和行为，但是自身的宽恕并不意味着可以逃脱事实的惩罚，我现在不正面临着一个事实的审判台吗？在择偶的人生大事上，多年来，我总是盲目地着眼于未来。未来，在我的想象中异彩纷呈，并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不知为什么，我确信无疑地认为，一个巨大的幸福正安卧在前面的什么地方，并静候着我的拥抱。正因为如此，我

才盲人瞎马，使许多珍奇无比的芽苞在身边枯萎、死亡。

没有一张大学文凭，没有一个五位数的存折，没有一个骑士般的身材和风度；一个因受恩赐而被收宠的弃儿，一个蜷曲在大都市石阶下的小湿虫，一个呆滞在高级文化科学中心的低能儿——看吧，这，就是未来，我的昨天的未来。“不错的，对方说你不错的，可人家有对象了。怨我，全怨我……”“去吧，”我挥挥手，朝着好多事的婚姻介绍人忿忿地说道。“你是窝藏犯，窝藏了耻辱，我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没有到那种连真实都可以丢弃的地步。”

但是去年三月我同“唐朝大美人”勾搭上了。那是食堂里的一个比我大六岁的洗碗工。眯眼、肥腮、尖嘴。可竟有人认为这全都出自于唐伯虎的画册。“过了三十五，还没有一个主……”——我无法知道这是由于她那一百六十来斤体重的原因。她缠着我讲故事，每当值夜班她就死死地缠着我不放。于是，深更半夜，我就给她讲鬼的故事。出于恐怖，她便将身子朝我移来。渐渐地，这个胖女人在我眼里变得妙不可言，终于有一夜，感官驱使我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动作。事情很快就张扬了出去，没有几天，全所上下便沸沸扬扬了。“现在没有五千块钱办不成事……”而大美人居然也就赤裸裸地同我办起了交易。我谴责自己，但并不过份，事情搞得不名誉，仅此而已。但我却有更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既然高级思维已不能给人带来丝毫的安慰，那么人就不得不去运动他的低级本能。既然人的意识范围受环境的压迫缩得如此之小，那么在这个缩小了的圈子里所感受到的一切都会变形。

既然……但是没有，说得清楚些，没有辩护。不想耗费那份精力。回想起来，后来我竟公然同大美人亲亲热热的，为的是用一种对生活、对众人恶作剧的快感维持那荒凉而又冷寂的内心平衡。

还是让我用这散漫的思维继续抬着父亲走一段吧……

我早就不能忍受他对我漠视了。这种漠视与他对徐焰的藏而不露的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之间时常争吵。体制改革、政策变动、国际形势以及所有一切生活现象都能成为纷争不休的起因。但是毋庸置疑，那小子是父亲的骄傲。我时常觉得父亲对他滔滔不绝的宏篇大论很有好感，而那种疾言厉色的训词往往只是为了对不易外露的父爱作些掩饰而已。可我们俩呢？我们之间除了大段大段的沉默之外，那就是寥寥可数的、和家庭妇女口头上挂着的一般无二的对话：“吃了吗？”“吃了。”“晚上回来吗？”“回来。”还有就是：“我看那个谁谁谁……”。早就想过了，没有父爱，也完全可以过得下去，这在我所失去的当中，还算不了什么。但是不，我们之间的骨肉之情并未泯灭：当他在码头为我能回到上海而闪烁起泪光时，当他在病房里小心翼翼地测试我额头上的体温时，这种感情曾以它的古老和神圣使我激动万分。但恰恰是通过这层温暖的软膜，我透视到了我们关系中的一种更为深刻的东西。

说得通俗些，这个级别不算低的党的干部，在考虑国家的命运、接班人的培养上根本就不把我当作一回事，我的课本，工农业余教育初级教材《语文》上下二册，《数学》上、